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

普列汉诺夫 机会主义文选

(一九〇三——一九〇八年)

上



(供内部参考)



2 023 2567 0

普列汉諾夫 机会主义文选

(一九〇三——一九〇八年)

上

虛 容 譯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

(一九〇三——一九〇八年)

上

虚 容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四二二五工厂印刷

1964年2月第1版

1973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书号3002-107 每册1.00元

内 部 发 行

60607/17

出版者说明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之一、“劳动解放社”的奠基者普列汉诺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曾经是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著名人物。一九〇三年以后，普列汉诺夫开始暴露出机会主义倾向。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时期，他成了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和理论家。以后，他曾一度同布尔什维克结成护党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最终地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堕落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四十多年来的政治生活是复杂多变的。他的政治思想变化过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民粹主义时期(一八七六——一八八三)；马克思主义时期(一八八三——一九〇三)；孟什维主义时期(一九〇三——一九一四)；社会沙文主义时期(一九一四——一九一八)。

孟什维主义时期的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的表现最为动摇不定，经常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倒过来倒过去”。列宁曾经指出：“从一九〇三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的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着：(一)一九〇三年八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二)一九〇三年十一月(《火星报》第五十二号)，主张同‘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建立和平；(三)一九〇三年十二月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热烈的孟什维克；(四)一九〇五年春天，布尔什维克胜利以后，争取‘敌对的兄弟们’的‘统一’；(五)一九〇五年年底到一九〇六年年中是一个孟什维克；(六)从一九〇六年年中开始，有时离开孟什维克，在一九〇七年伦敦代表大会上斥责孟什维克……‘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七)一九〇八年同取消派决裂；(八)一九一四年又

重新转为取消派。”(《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 359—360 页)

大体说来,普列汉诺夫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建党时期的调和主义立场、革命时期的最右翼的立场和反动时期的护党立场。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由于要保持党内无原则的“团结”,害怕分裂,普列汉诺夫坚决主张向孟什维克的修正主义立场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行为作无限制的让步。他不顾布尔什维克的警告,在《火星报》第五十二号发表了《不该这么办》一文,从而把党内的意见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列宁曾经把这篇文章称为“划时代的作品”,它判然地划开了普列汉诺夫政治生命史的黄金时代和堕落时代。

这一时期,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根本分歧在于究竟应该建立什么类型的政党。和列宁相反,他主张按照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方式和原则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普列汉诺夫不了解党内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否认孟什维克是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声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分歧是“无谓的争吵”。他反对向修正主义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主张采取“温和的手段处死修正主义者”。在他看来,“有时对破坏纪律的行为闭着一只眼睛是有益的”。对于党内斗争的策略问题,普列汉诺夫除了所谓“团结”的激昂而抽象的空谈以外,不能作出任何有益的事情。

第一次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策略基础上的严重分歧首先表现在对待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态度问题上。普列汉诺夫从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的一般原理出发,得出“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错误结论。他认为应该把即将到来的“政治斗争的重担,哪怕是部分地从无产阶级肩转移到资产阶级肩上”。他说:“如果我们抛弃了这个资产阶级,说现在根本不能期待它会为自由的事业作出什么成绩来,那么我们这样做就会违反革命的直接的和明显的利益”。所以普列汉诺夫反对“过早的起义”,认为这种“尝试会把有产阶级驱赶到政府的怀抱中

去”，“这种为时过早的吓退资产阶级的企图”必须受到“坚决谴责”。

与此同时，普列汉诺夫低估了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农民只有放弃自己私有者的观点时才是革命的。他引申了一条“无可争辩的规律”说，“资本主义越是接近自己的终点，小资产阶级就越会愿意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反之，资本主义离开自己的最终灭亡越远，则小资产阶级就会更加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矛盾的观点”。俄国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此，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与其说是革命的，不如说是保守的。

普列汉诺夫在《论夺取政权问题》、《与友人通信选录》等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孟什维主义的革命战略原则。他所论证的俄国“革命路线”几乎是十八世纪法国革命路线的再版。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应该和资产阶级“互相亲善”，“分开走，一起打”，而不要和农民结成联盟，领导他们发动过早的武装起义，以免吓退资产阶级，使革命遭受失败；在革命胜利以后，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而只应在国家杜马一类的代表机关内做一个“极端的反对派”，以便推动它走上立宪会议的道路；然后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当资本主义经济在俄国有了充分的发展以后，再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很明显，这条路线的实质就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使它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他在回答究竟谁领导谁、谁应当跟着谁走的问题时说：要求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那就“等于给社会民主党签署了死刑判决书”，要求资产阶级跟着无产阶级走，这种呼声“一定会成为荒漠的呼声，也等于向壁清谈，毫无意义”。两者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丝毫的愿望”跟着对方走。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一再重复的“分开走，一起打”的口号的根本内容。

普列汉诺夫为俄国无产阶级拟定的“革命路线”中的另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是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他不

了解实行这种专政乃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一般的、基本的阶级条件。他说，列宁的这种思想只会导致“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所以他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者参加小资产阶级政府。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参加以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占统治地位的政府，那么除了对他们的反动的和保守的措施承担责任并帮助他们欺骗人民以外，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他的“极端反对派”口号就是为了对抗工农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思想而提出来的。

总起来说，否定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低估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用平行领导论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思想，提出议会主义的“极端反对派”口号来代替工农民主专政理论，——这四者构成了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主义战略思想的基本内容，也是他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时期全部策略主张的理论基础。

普列汉诺夫在策略基础方面的这些错误观点，决定了他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有：土地问题、国家杜马问题、暴力和武装起义问题、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党和工会的关系问题等。

在土地问题上，普列汉诺夫主张实行土地市有方案，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草案。他认为土地国有草案“是反动的，因为它会促使半立宪制政府在同革命党派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它没有提供“防止复辟的保障”，而且“同革命家夺取政权的空想密切相关”。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分配土地虽然有許多不方便的因素，但比国有化要强得多；当然最合乎愿望的措施是土地市有方案，因为土地市有是“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即使在民主革命不彻底进行的情况下也能实现。

在杜马问题上，普列汉诺夫主张不但不要抵制杜马选举，而且还应当参加到杜马内部去，应当同立宪民主党达成选举协议，应当使杜马从反革命的工具变成革命的工具，以便推动它走上立宪会

議的道路。他的基本理由是：杜馬“站在革命的大道上”，因為杜馬中占統治地位的是立憲民主黨人，而這個黨代表着“革命的”自由資產階級，如果抵制杜馬，撇開杜馬，就有使資產階級脫離革命的危險，也不能提高對杜馬還抱有幻想的廣大群眾的覺悟，結果不是孤立了敵人，而是孤立了自己。所以他認為抵制策略是錯誤的和有害的。普列漢諾夫認為俄國革命應該走議會主義的道路，硬說杜馬是“全民代表機關”，它代表“全民的意志”，因此應當在“全權杜馬”的口號下，使杜馬產生出“責任內閣”，這樣就可以用“全民鼓動的文火”來消滅專制制度。

普列漢諾夫在暴力和武裝起義問題上的基本看法是：在俄國當時的條件下“不要拿起武器”。他不承認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取得統治地位的必經途徑。他認為暴力根本不同於實力，它只是實力的一種表現形式。革命的勝利取決於實力的發展。至於暴力，那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使用。俄國無產階級既不能進行合法活動，所以武裝起義是必要的。但是起義要獲得勝利必需具備兩個先決條件：一是自由資產階級的同情和支持，一是政府權力的瓦解。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就“不要拿起武器”，而要發展實力，喚醒人們的政治意識。所以普列漢諾夫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黨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和平的宣傳工作和工會工作。

普列漢諾夫反對組織群眾運動。他認為俄國無產階級的人數很少，覺悟很低，他們絕大多數還受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組織群眾運動，只會使革命力量遭到慘敗。所以在他看來，十月總政治罷工以後的“第二次罷工是錯誤的”，“第三次罷工也是錯誤的”，對於十二月武裝起義，他更公然譴責說：“本來不需要拿起武器”。

從一九〇六年起，普列漢諾夫發表了不少關於黨和工會的關係問題的言論。在這些言論中，他一貫堅持自己的“工會中立論”。他反對把政治分歧帶到工會中去，反對黨應當領導工會。他的主要理由是：俄國有十個無產階級政黨，如果提出工會服從黨的領導

的口号，就有造成无产阶级分裂的危险。

普列汉诺夫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革命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就是如此。所有这些观点实质上反映了立宪民主党的策略路线。列宁曾经反复指出，普列汉诺夫执行的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工人政策，他宣扬的是机会主义的阶级调和论，并着重指出：“普列汉诺夫只是比别人更突出更露骨地表明了整个孟什维克政策的内部实质和基本倾向：以迁就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来代替工人阶级的独立的路线。”（《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432—433页）

由于普列汉诺夫当时享有巨大的威望，被认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由于他在文章中常常大量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词句，他的这些言论就更富于欺骗性。列宁写道：“普列汉诺夫的这种策略上的机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原理的全盘否定”，“他在这方面表现的机会主义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带来的危害性，要比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给德国工人带来的危害性大百倍。”（《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398—399页）

揭露和批驳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谬论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党最重大的一项政治任务。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以后，同普列汉诺夫的论战在列宁的著作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构成了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所进行的第一次大论战的主要内容之一。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尖锐地、针锋相对地批判了普列汉诺夫的所有这些机会主义的策略观点和组织路线。列宁在这方面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收在《列宁全集》第七卷至第十三卷中。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篇：《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进一步，退两步》、《论临时革命政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糟糕的意见》、《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策略上的动摇》、《论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参议院的新解释》、《卡·考茨基〈俄国革

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的俄译本序言》、《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论机会主义的策略》、《不应当怎样写决议》、《〈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普列汉诺夫和瓦西里也夫》、《反对抵制》、《〈十二年来〉文集序言》、《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一篇论文》、《社会民主党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工会的中立》、《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论冒险主义》、《谈谈辩证法问题》、《国家与革命》等等。

本书选材于二十年代苏联国家出版社出版的俄文版《普列汉诺夫全集》，包括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到一九〇八年年初的论文、短评和发言共七十余篇。除了少数几篇是摘译外，大部分全文收录，分上下两册出版。此外还选译《马克思哲学的进化》等三篇，作为附录，载于书末。

所有的文章都按发表时间的先后顺次编排。在每篇文章之前我们加了一个简短的按语，试图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文章的基本论点、列宁的重要批评、意见等作一些交代说明，以供参考。作者所引证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文字，几乎全部加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中译本的出处。凡引文与中译本有出入的地方，都按照普列汉诺夫本人所引的文字译出。

目 录

出版者說明

不該这么办 1

对列宁同志的信的答复 (《火星报》編輯部) 10

略論“經濟主义”和“經濟主义者”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几点公开意見) 14

答尼·列宁同志关于他退出《火星报》編輯部的信

(《火星报》編輯部) 24

关于使得列宁同志退出《火星报》編輯部的情况的信 27

可悲的誤会 31

評烏发人和烏拉尔人的信 (《火星报》編輯部) 43

意大利社会党人波倫代表大会 (摘录) 46

附：实力和暴力 (論革命策略問題) 48

集中主义还是波拿巴主义？

(开导替自己請来沙皇的蛤蟆的新尝试) 58

現在不能沉默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 73

答利亚多夫同志 79

工人階級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識分子 84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會議上的发言

(一九〇四年九月二日) 112

論我們對待自由資產階級反沙皇制度鬥爭的策略

（致中央委員會的信）	115
分開走，一起打	136
論奪取政權問題（不大的歷史證據）	146
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體黨員的公開信	157
退出《火星報》編輯部（致《火星報》編輯部的信）	160
小冊子《在兩條戰線上》序言（摘錄）	162
關於我的《日誌》的幾句話	164
“農夫們在暴動”	165
論我們的幾點“不足”	177
與友人通信選錄（致《無產者報》編輯部的信）	187
相仇的弟兄	223
我們的處境	240
小評（摘錄）	271
再論我們的處境（致 X. 同志的信）	272
論俄國土地問題	286
論黑幫分子	310
論杜馬選舉（答 G. 同志）	318
在斯德哥爾摩統一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328
關於土地問題的發言	329
關於土地問題的總結發言	333
關於對待國家杜馬的態度問題的發言	340
關於武裝起義的發言	343

不該这么办

本文发表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七日第五十二号《火星报》，是普列汉诺夫的第一篇机会主义著作，是他从马克思主义者堕落为机会主义者的起点。列宁曾称它是“划时代的作品”（《列宁全集》第七卷第475页）。

普列汉诺夫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和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但是在十月的同盟代表大会以后被孟什维克的破坏活动吓倒了，决定对他们采取调和主义的让步立场。本文就是这种立场的第一个公开表示。它把党内的意见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从此以后，普列汉诺夫就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的“晴和的初秋”，而开始了政治道路上的孟什维主义时期。

本文的“基本思想就是，认为在政策方面不应当采取太激烈太不让步的莽撞的态度，认为有时为了避免分裂，对修正主义者……以及对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实行让步，是必要的。”（《列宁全集》第七卷第362页）

“这篇文章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马尔托夫分子钻进编辑部的唯一的入场券。有两个口号——修正主义（应该用宽恕敌人的态度同修正主义进行争论）和无政府个人主义（应当用温和办法使无政府个人主义就范），特别鲜明地印在这个入场券上。”（同上第369页）

列宁在《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同上第98—102页）和《进一步，退两步》（同上第341—410页，特别是第361—373页）中对普列汉诺夫这篇文章的立场和观点作

了詳細的分析批判。

随着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增长和巩固，它的自觉的代表所起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了。以前，在現今所謂小組习气时代（不过应当不念旧恶，因为它給我們留下了不少珍貴的遺產），我們的錯誤的有害影响还只限于一个小組或几个小組的狹小范围。現在我們同群众接触，这个影响就广泛得无法比拟了。而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終於得到它如此必需的中央集权制組織的时候，中央所犯的每一个錯誤就必然流毒所有的地区。給誰的多，对他的要求就多^①。我們的中央所需要的人物不仅必須勇敢坚定，果断頑强，而且也必須极端謹慎。他們的确要聪明得像蛇一样^②。

而政治上聪明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善于估計具体形势。凡是不具备这种本領的人，都沒有从事政治活动的天資。这时，如果不再扮演任何負責的政治角色，那会更明智些。政治，要求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头脑非常灵活；它沒有一成不变的永恒規則。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是現在，當我們的队伍里已經开始流傳一种向往这种規則的傾向而將給我們党帶來巨大損害的时候，提一提这个道理并不是沒有益处的。我們知道，产生这种傾向其用心是极为可敬的。它是为了克服曾經使我們的“經濟主义者”弄得如此狼狽不堪的那种漠視政治原則的态度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但可惜的是矯枉过正了，結果完全是事与願違，因为它可能使我們整个的政治思維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性质，这种性质正是對我們的事业构成极大危害的“經濟主义者”的思維的特征。經濟主义者的推論是按照“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以外，都是鬼話”的公式进行的。他們的做法說明他們完全沒有能力提高到辯証法的水平，因为辯証法的基本原理說，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一切都以時間和地点的情况为轉移。同这些頑固不化、无可救药的形而上学

① 語出《聖經》《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八节。——譯者注

② 語出《聖經》《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譯者注

者进行斗争，是符合革命运动利益的需要的。但是如果为了彻底战胜他们，我们竟而模仿起他们的思想方式，如果我们本身对政治上的片面观点也迷恋起来，那么我们的胜利就远不会像我们至今所认为的那样有成效。其次，在这种场合，另一个好嘲笑的人也许就会不无根据地问我们：究竟谁胜利了——你们还是你们的敌人？

列宁同志在一篇登载于《曙光》杂志第四期上专论我们的土地纲领的文章^①中机智地嘲笑了“著名的鸟儿的直线性”。不仅在讨论土地问题时应当常常记起他的机智的嘲笑。在政治实践上“著名的鸟儿的直线性”比在理论推论上还要危险。其所以尤其危险，是因为人们容易错认为这是一种坚毅的性格，其实它同坚毅的性格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同通常的顽固作风倒是更容易和和睦相处得多，不过这种顽固作风绝对不会保证有任何明确的政治思想，绝对不会保证对既定的目标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任何意向，因为大家知道，走直线的和作风顽固的人常常不是有始有终的。

政治上一成不变的永恒规则必然会迅速地招致失败。谁希望得到应有的胜利，他就应当只把自己无论如何要达到的目的的愿望看成是唯一不变的。在他那里，其余一切都是可变的，也应当是可变的，因为其余一切对他来说只有相对的价值。

我们希望，下面的例子会很好地表明，我们必需在何种程度上避免“著名的鸟儿的直线性”。

我们所有的人，所谓正统派，换言之，即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们，必须同“修正主义”的一切形态和一切变种进行坚决的和不可调和的斗争。修正主义同我们的观点完全不一致。它的最后结论是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因此，只有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同现存资产阶级的秩序妥协的人才能同修正主义和解。这是一般的规则。试问，这是不是说，我们永远都要仇视修正主义，随时随地都必须仇视修正主义者呢？有“著名的鸟儿的直线性”这个

^① 指《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参看《列宁全集》第六卷第87—126页。——译者注

思想特点的人一定会說，是的。我們則认为，無論在什么地方，我們的实际策略都应当取决于时间和地点的情况。这似乎是奇怪的。但讀者馬上会看到，其实沒有任何值得奇怪的地方。

試想，我們的中央（它自然应当由“修正主义”的坚决的和不可調和的敌人組成），是在同这样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个或几个集团打交道，他們起先沉湎于“修正主义”的影响，并以“批評自由”的名义同“正統派”斗争过，而現在則看到了批評自由中所包含的那种危险性，并且承认了“正統派”社会主义即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現在只是由于某些不彻底性以及所謂思想上的惰性，他們还在保卫着“修正主义者”所喜爱的这些或那些“教条”。我們的中央应当怎样对待这些集团呢？把他們革出教門么？把他們开除出党么？这也許是容易的，而且当然是再“直綫”不过了。但是这样做合不合适呢？换言之：这样做**對我們党的統一以及对跟同一个“修正主义”作斗争是不是有好处呢？**我們以为：否。

我們究竟为什么同“修正主义者”战斗呢？为的是剝脫他們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因為他們把无产阶级指引到錯誤的道路上去。因此，同他們进行战斗不是为了战争，而是要达到削弱“修正主义”的目的，而如果战斗达不到这个目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战斗不仅**不会削弱**上述影响，反而会**加强**这种影响，那么它就会成为**有害的**，那时最好尽快停止战斗。然而在我們上面所假定的場合下，同“修正主义者”的战斗恰恰不会削弱“修正主义”的影响，而是加强这种影响，因为它会妨碍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同“修正主义”彻底破裂，或者甚至会驅使他們重新同它接近。因此这样做会損害党的利益，而那些仍然认为应当宣战的人，就会暴露出不可原諒的迂腐和駭人听闻的近视。我們的中央应当具备充分的**尚武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对于它这个革命阶级的代表說来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凡屬我們党的利益要求**和平**的地方，它就必須**爱好和平，温和待人，善于让步**。捍卫头等重要事业的有組織的无产阶级的領導者，在自己的尚武傾向違反政治利益时，是沒有权利迷恋这些傾向的。

有一些毫无气节的人——这已经是许许多多年的事了——用一种应当得到更好得多的用场的顽强精神哭哭啼啼地建議我們“用同志方式进行辯論”，这些人是很可笑的，而且也可以說是可伶的。然而他們为什么可笑而且可伶呢？仅仅因为他們用自己的政治上的天真想法强要我們把根本不可能同我們一道走的那些……“同志”当作同志。如果他們劝我們寬恕那些可能成为我們的同志并且已經在成为我們的同志的論敌，則他們的劝告就会是很合理的，因此这些劝告本身就值得贊揚，而不是可笑的了。尖刻性只有在适当的地方才是好的。不合时宜的尖刻性与其說是“正統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作風，不如說是梭巴开維支^①的作風。

关于尖刻性在某个个别場合是否适当的問題，自然只有通过权衡这个場合所固有的全部情况才能決定。但是毫无疑义，現在我們不应当尖刻地对待某个时候曾經傾向于“經濟主义”的同志。这些同志的极大的荣誉，应当說是他們絕大多數人在看到了按其思想方式同“經濟主义”有血緣关系的伯恩施坦主义会导致什么結局以后，已經开始日益同我們接近，并且承认了“正統的”社会主义的一切主要原理。不錯，我們現在也还在同他們中間許多人就什么問題进行爭論；意見分歧並沒有完全消除。但是現在这些意見分歧是很不重要的，完全不值得为着这些分歧而面紅耳赤，爭吵不休。再說一遍：如果这些并不重要的意見分歧繼續把我們分成两个敌对的陣营，这对我們的事業將是很有害的。以前我們斗争过，現在我們可以以交換思想为限。以前我們有《曙光》杂志和《火星报》的拥护者同《工人事业报》和《紅旗》杂志的拥护者；現在我們只应当有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他們的观点，無論在細節上彼此間怎样不一致，都可以方便地在同一个机关报的篇幅上表达出来。这个刊物热情地欢迎这些人或者那些人表示态度。現在还没有这样做。但这定会給我們党带来很大的利益，所以应当这样做

① 果戈理小說《死魂灵》中的一个粗魯的地主形象。他的名字后来成了莽撞、頑固、愚鈍、慳吝的同义語。——譯者注